

黑水城写本《劝学文》考释

——兼谈亦集乃路的教育问题

张蓓蓓

(鲁东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25)

摘要: 黑水城出土的写本《劝学文》是儒家名言和民间谚语相结合的语录式文段, 体现下层士人的思想与期盼。据其内容及相关文书推知亦集乃路的教育以启蒙教育为主, 教材多为儒家经典, 学校具有“庙学一体”与“斋舍合一”性。该写本的创作时间应该不会早于延祐二年(1314)。

关键词: 劝学文 启蒙教育 儒家经典

中图分类号: 120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2020)02-0140-10

黑水城出土的写本《劝学文》, 是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于1983、1984年在黑水城遗址所发掘的文书之一, 现藏于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该文书有题名“劝孝文”, 其内容未见于传世文献。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以下简称《李书》)有录文。^①该文又被收录于《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七卷。^②该《劝学文》稍有残损(如图1)^③, 凡七行, 现录文如下:

1. 劝孝文
2. □有先生教国孝 □□又□□偁抽觔
3. □几年小没穿的 又[挨]头□没人处
4. 今春且□来岁过 桑[条]大了尉不屈
5. 儿孙大了教不成 当年不贵四十两

收稿日期: 2019-07-05

基金项目: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夏文学文献整理研究”(17CZW039); 鲁东大学项目“西夏文学文献研究”

作者简介: 张蓓蓓(1985-), 女, 山东青岛人。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敦煌学、西夏学研究。

^① 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年, 第200页。

^② 塔拉、杜建录、高国祥等编著《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七册),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年, 第1488页。

^③ 以下所用图片均选自塔拉、杜建录、高国祥等编著《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

6. 几曾饿死读书人 至圣文宣王有语

7. 君子忧道不忧贫 国家挂榜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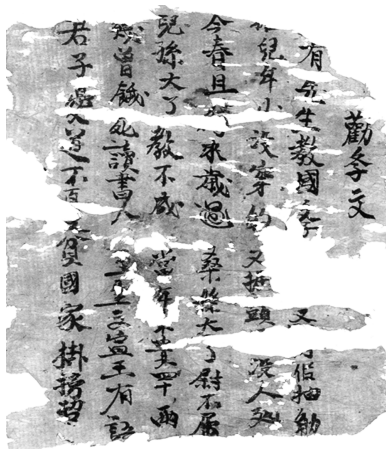
该《劝学文》虽短短几十字，却包含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既谈到了劝学的思想与主张，又体现了彼时人们对学习的认识，也反映出当时当地的教育内容与状况。

一、《劝学文》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与创作时间

（一）《劝学文》的思想内容

“劝学”顾名思义就是勉励、劝说别人学习。要做到劝勉有效，则至少需要讲清三个问题，即学习意义、学习内容、学习方法。此三者逻辑严谨，顺序不能调换。黑水城出土的《劝学文》基本具备这三方面的内容，只是逻辑缺乏严谨性。该劝学文并没有在文章伊始明确学习意义，它首先强调的是学习时机。“桑条大了尉不屈，儿孙大了教不成”以比喻的修辞方式形象地指出了幼儿启蒙教育的重要性。明代的儿童启蒙读物《增广贤文》也有类似的谚语“桑条从小郁，长大郁不屈”。《增广贤文》是由流传于民间的谚语、格言汇集而成的，而这篇劝学文语言俚俗，逻辑不强，其性质与《增广贤文》相似，多为谚语和文献佳句的选编整合。

一篇有说服力的劝学文首先应该明确学习意义，该劝学文虽然也提出了学习意义，但将其置于学习时机之后，这是逻辑不严谨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阐述的学习意义与历代正统劝学文多有不同，历代劝学文价值导向明确，劝学者常常立足于个人道德修养与国家发展需要，提出诸如“学以明伦”“学做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与宏伟目标，而该劝学文的价值导向却有悖于主流思想。“几曾饿死读书人”真实地反映了一种观念，即读书可以保证或者改善一个人的经济生活。作者所认识到的学习意义浅鄙，表明了创作者见识短浅，劝学目的庸俗，这与伪托于宋真宗的《劝学诗》所宣扬的价值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极为一致，读书可以富贵利达荣身饱家。元初童蒙教子读物《详说古文真宝大全》将署名宋真宗的《劝学诗》置于卷首，足见该诗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与影响。正如《沈氏家训序》所言：“凡父兄之教其子弟，师友之相为劝勉者，率不外是。”^①自宋元以来，上层士人对《劝学诗》的价值导向及社会影响多持批判态度，但因其体现了下层士人的理想，所以



（图1：M1·1229

[Y5: W10]）

^① 沈鲤《亦玉堂稿》卷6《沈氏家训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287页。

“乡塾中多以此为读书人佳话”。^①黑水城抄本《劝学文》很明显是受到了《劝学诗》的影响，其内容也体现了下层读书人最朴素的愿望，因为解决温饱断然不是上层士人所考虑的问题。所以，该《劝学文》亦为民间劝学文，多为家学或乡塾所用。

历代劝学文多以儒家经典作为学习内容，该劝学文也不例外。虽然该文并未直接指明学习内容，但文中援引孔语，表明创作者尊崇儒学，同时也说明孔子以及儒家思想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与影响。创作者既尊崇儒学，就不排除其提倡学习儒家经典的可能。事实上，黑水城出土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作品，足以印证这种可能性是确为存在的。与《劝学文》同时出土的M1·1135 [F234; W10]号文书，就明确记载了“总府劝谕儒户人民、良家子弟学习《诗》《书》”。^②因此，可以肯定该劝学文所倡导的学习内容是儒家经典。

（二）《劝学文》的艺术特色

从艺术表现手法看，通俗、直白是该《劝学文》较为突出的特点。面对文化水平有限的说理对象（读者或听众），劝学类文章既要彰明事理，又需深入浅出，不宜因辞害志。该劝学文在强调学习时机的重要时，就用十分贴近百姓生活的桑条这一物象进行比喻：“桑条大了尉不屈，儿孙大了教不成”，其文对仗工整，将“学习要趁早”这一观点贴切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引前贤之论也是劝说类文章所常用的表现方式。该文“至圣文宣王有语，君子忧道不忧贫”即是引孔子之言语劝学，如此引述显然比作者直言更加有力量，且更令人信服。

劝说类文章如果能以实际案例作为论证，就不会显得空洞没有说服力。细读本文，作者在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时，运用了实例阐释的手法。“当年不贵四十两”，“当年”所暗含的社会事件或社会状况，应该为劝学者与被劝学者所熟悉。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当年”所谓何事，但是据文意可知，“当年”的社会事件或状况一定是糟糕的，即使再糟糕，也未曾饿死过读书人。“几曾饿死读书人”，作者以反问的语气，进一步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意义。实例阐释与反问句式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增加了表达的可信度，使得说理更加透彻有力。

从语言表达看，该文缺乏文人劝学文的典雅，没有华丽的辞藻，文字朴实，甚至略显俚俗。“似抽筋”“没穿的”“桑条大了”“不贵”“饿死”等直白的语言，反而给人一种朴实无华不矫情的质朴感，这种质朴感在传世劝学文中是比较少见的。这种感觉特别像一个家境贫寒的老父亲在谆谆教导自己的孩子要好好读书。我们在看到作者见识短浅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当时百姓生活的艰辛，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作者的浅鄙。这一层次的普通百姓，内心最关注的不是如何培养与历练人格，也不是如何建设自己的国家，而是如何解决生存问题。作者能够抓住被劝学者内心深处的渴求，切实地站在被劝学者的立场

^① 廖寅《宋真宗〈劝学诗〉形成过程及作伪原因考述》，《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148页。

^② 塔拉、杜建录、高国祥等编著《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7册，第1413页。

来谈学习问题，这样的表达方式更贴近劝学对象的现实，更容易走进劝学对象的内心。

（三）《劝学文》的创作时间

该文并无时间款识。《李书》言，当时所发掘的全部文书，“除少量属于西夏时代的佛经外，其余都是元代至北元初期的遗物”。^①文中所用的“孝”字为元代通行的简俗字。文中的“至圣文宣王”是元代大德十一年（1307），元成宗特诏命孔子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些都可以证明该文为元代所写。另外，文中“当年不贵四十两”、“国家挂榜招□□”也可以为该文的创作时间做进一步推测提供依据。

从货币政策来看，元代有着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纸币流通制度，也是历史上少有的以纸币为主要货币的封建政权。但由于商品供给萎缩、财政开支渐巨等原因，其货币系统走向了严重通胀的局面，及至元末政府已无力控制。有学者测算，以当时人均可得货币量为例，元中统元年（1260），发行纸币即“中统钞”七万余锭，人均约合62文；至元二十四年（1287），发行额为五百余万锭，人均约合13134文，增加212倍，物价上涨了数十倍；至元武宗变更钞法的至大三年（1310），发行至大银钞145万锭，合约中统钞3600多万锭，人均约77765文，比中统初增1253倍。^②如此严重的通胀水平，使纸币贬值十分迅速，百姓手中的钱越来越多，但却越发没有价值。因此《劝学文》中言及四十两“不贵”，暂不论该“两”是指银两或是丝钞，^③能够产生如此认知，定是在较为严重的通胀局面下才有可能的，换句话说，至少应在武宗变更钞法之后。

另一方面，文中言“国家挂榜招□□”，“挂榜”应指科举考试。元初并未设科举制，元仁宗朝皇庆二年（1312）十一月下诏重兴科举：“其以皇庆三年（1313）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④又“延祐二年（1314）春三月，廷试进士，赐护都答儿、张起岩等五十有六人，及第、出身有差。”^⑤这是元重兴科举之后首次放榜公示进士。所以，该文很可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综上所述，该《劝学文》的创作时间，应在元成宗加谥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1307）之后，在元代通货膨胀愈发严重之时，即武宗变钞法之后，且应在元重兴科举之后，即不会早于延祐二年（1314）。

二、亦集乃路的教育

（一）亦集乃路的教育以启蒙教育为主，教材多为儒家经典

^① 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0页。

^② 俞晖《论元代的通货膨胀》，《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第119页。

^③ 《元史·钞法》载：“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值，并从丝例。”见〔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369页。

^④ 〔明〕宋濂等撰《元史》，第2018页。

^⑤ 〔明〕宋濂等撰《元史》，第2026页。

传世典籍关于西夏至元时黑水城的教育问题记载甚少，所以出土文献中与教育相关的文书就显得相对重要。除上述《劝学文》外，黑水城还出土了几件与教育相关的文献，虽然数量有限，但其价值不容忽视。

黑水城出土文书中，有西夏的韵书、蒙书、法典、诗歌、类书、佛经，还有译自中原的类书、经书等，这些丰富的藏书都证明自西夏时这里的文化事业就很发达，学校教育昌盛。《宋史》卷四百八十六载，西夏崇宗“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仁宗更是提倡儒学，“尊孔子为帝”，重视学校教育，并令各州县立学校，弟子员“增至三千”。^①“十四年，夏改元为人庆。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②人庆三年（1146），西夏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③因此，西夏和中原一样，实行庙学，且庙学合一，以此达到推行儒学教育的目的。西夏乾祐七年（1176）在甘州所立黑水河建桥敕碑，立石碑的相关人员中有“都大勾当镇夷郡学教授王德昌”，可见甘州有郡学之设，并有总管郡学的学官教授，可以推知西夏其它州郡也有郡学及学官。^④西夏统治者重视学校教育，西夏谚语“不孝父母恼祸多，不敬先生福智薄”^⑤将尊重老师提升至孝顺父母的高度，足见其对老师的重视，与之亦反映出对教育的重视。

西夏自崇宗之后就推行汉文化，所谓汉文化，主要是儒家的一整套伦理道德观念。西夏翻译出版的儒家经典很多，诸如《孝经》《论语》《孟子》等，西夏人自己创作的具有儒家思想的著作也不少，如《新集慈孝记》《贤智集》《德行记》《番汉合时掌中珠》等。西夏的学校教育、科举取士皆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政府官员行事，以儒家思想、制度为准绳，甚至审判断狱都要依靠宣说《孝经》。^⑥由是见之，儒学教育在西夏时期已深入人心。

西夏灭亡后，黑水城仍被元朝所用，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在此设亦集乃路总管府，归甘肃行省所管。在《李书》所收文献中，未见有西夏时期当地学校的记载，但却有元代学校的记载。这些文书证明了亦集乃路儒学的存在，“也许是西夏时期黑水城儒学的延续”。^⑦

儒学教育分为小学与大学两级，小学主要进行启蒙教育，这种分级最初出现于宋朝。顾宏义指出，《京兆府小学规》订立于仁宗至和元年（1054），是年两浙地区浦江建小学于庙学中，湖州于仁宗时修缮州学时复立小学于州学之东南隅，嘉佑八年

① [元] 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30页。

② [元] 脱脱等撰《宋史》，第14024页。

③ [清] 吴广成撰，龚世俊、胡玉冰等校注《西夏文书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17页。

④ 史金波《西夏时期的黑水城社会》，载沈卫荣主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32页。

⑤ 陈炳应译《西夏谚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页。

⑥ 陈炳应译《西夏谚语》，第83-84页。

⑦ 沈卫荣主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第432页。

(1063) 重修海盐县学时“设宾位、小学于西庑”，并据之推测，宋代州县小学至迟出现于仁宗中期。^① 元代因袭宋制，在地方官学亦设小学。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诏令江南诸路设小学，由老成之士教之，亦可自愿诏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② 自此，江南诸路儒学小学的设立如雨后天春笋。据史料记载，庆元路、集庆路、镇江路、太平路、福州路等江南诸路皆设儒学小学。但是，这些史料中，并没有亦集乃路设立儒学小学的记载。从黑水城出土的习抄儒家典籍及相关的府学文书看，亦集乃路跟其它诸路学一样，亦设儒学小学。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所收录的有明确定名的习抄文书中，儒家经典所占的比重最大。其中，《孝经》13件，《论语》11件，《孟子》5件，《大学》3件，还有《朱文公小学》（只含题名）。出土文献中有部分文书，因破损而被整理者笼统地拟为“习字”。如，编号 M1·1214 [83H·F2: W32/0099]、M1·1221 [84H·Y1 采: W68/2738]、M1·1225 [84H·F224: W37/2459] 皆拟定名为“习字”。经笔者考察，该文书实际是“习抄《论语》”；编号 M1·1220 [84H·Y1 采: W82/2752] 当定名为“习抄《孟子》”。现以拟定名为“习字”的编号 M1·1218 [84H·Y1 采: W101/2771+Y1: W68b+ Y1: W101d]^③ 文书为例（如下图2），略加分析：

这一残页被拟定名为“习字”。该文书由上、中、下三个残片组成，实际是习抄《童蒙须知》，现参考《朱子全书》所收录的《童蒙须知》，分别录文如下：

第一部分（上）为：

自有圣贤典训昭

然可考当次第晓达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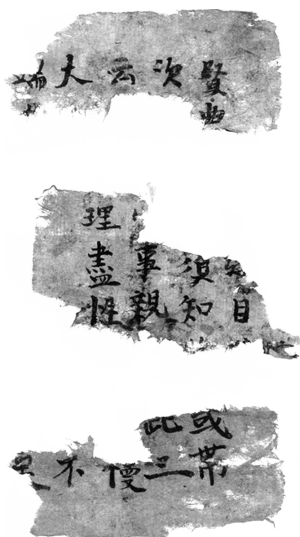
不复详著云衣服

冠履第一大抵为人

先要身体端整

第二部分（中）为：

今逐目条例名曰



(图2: M1·1218
[84H·Y1 采:
W101/2771+Y1:
W68b+ Y1: W101d])

① 顾宏义《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5页。

② 王颀点校《庙学典礼》，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6页。

③ 塔拉、杜建录、高国祥等编著《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七册），第1475页。

童蒙须知 若其修身

治心 事亲 接物与夫

穷理尽性 之要

第三部分（下）为：

腰谓以绦 或带 束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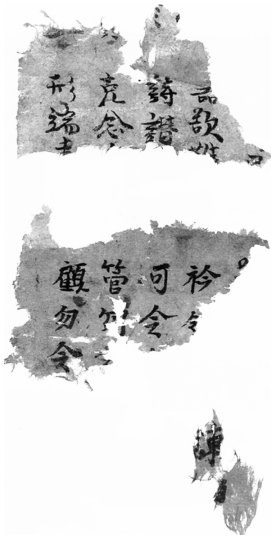
脚谓鞵袜 此三者要

紧束不可宽 慢 宽慢

则身体放肆 不 端严

为人所轻贱 矣^①

朱熹《童蒙须知》，一作《训学斋规》，经复原缀合，上面三个部分的正确顺序当为：中上下。而且第三部分（下）可以与编号 M1·1219 [Y1: W101c+Y1: W101b]^②（图3）中的第二部分缀合。



编号 M1·1219 [Y1: W101c+Y1: W101b]，亦拟定名为“习字”，也是有上下两个残片组成，上面这一残页实际是习抄《千字文》，录文如下：

罔谈彼短 靡恃己长

信使可覆 器欲难量

墨悲丝染 诗赞羔羊

景行惟贤 克念作圣

德建名立 形端表正

其中，“景行惟贤”，“德建名立”两句中的“贤”与“立”两字的最后一笔都非常清楚。而“墨悲丝染”中“染”字的三点也很清晰。

（图3：M1·1219 [Y1: W101c+Y1: W101b]）这一编号中的下面这一残页也是习抄《童蒙须知》，录文如下：

凡 着衣服必先提整

衿领 结两衽纽带不

① [宋]朱熹撰，严文儒点校《童蒙须知》，载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1页。

② 塔拉、杜建录、高国祥等编著《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七册），第1476页。

可令有阙落饮食照

管勿令污坏行路看

顾勿令泥渍^①

这两个编号的文书缀合之后，其内容基本上是朱熹《童蒙须知》的开始部分。《童蒙须知》也是启蒙教育所用之书，它对儿童生活的起居、学习、道德礼节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除上述所言的习抄经典，还有一些书籍印本残页也可以说明亦集乃路的教材问题。这些残页显示，亦集乃路所用教材既有元政府的指定本，也有富含其民族特点的独特本。这些独特本当是根据居民需要，用元代硬译体语言进行注释的。如，《孟子》印本残页有三件，其中，M1·1255 [F19: W14]^② 与 M1·1257 [F21: W23]^③ 是元政府指定的朱熹集注本。而 M1·1256 [F197: W2A]^④ 则是亦集乃路特有的一种版本。这种版本既不同于元代通行的朱熹集注本，也不同于赵岐注本。该版本所注文字浅显易懂，当为初学者所用。再如 F43: W2《孝经》“圣治章第九”残页，用元代硬译体语言注释经文，便于蒙古人学习儒家经典。这种注释甚为肤浅，与通行的邢昺注释本相距甚远。再如 F1: W67《尚书·周书》残页，连“曰”“呜呼”这样的常用语都标出注释，较孔颖达注疏本则仅为皮毛，适宜初学者所用。^⑤

上述习抄文书与教材多与儒家经典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儒家经典正是《元史·选举志》中所规定的生员必先习读之书，而对于供学生继续深造用的儒家经典则是少之又少。《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⑥ 黑水城出土的适于生员进一步深造用的《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等经典，只见《尚书》一种。^⑦ 这就足以说明亦集乃路的教育是以启蒙教育为主的，教材也正如《元史》所定，多为“必先”习读的儒家经典。

（二）亦集乃路的学校具有“庙学一体”与“斋舍合一”性

元代京师有国子学，始建于“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⑧ 地方有路、府、州、县学，亦集乃路作为甘肃行省的下路，必奉诏令，亦置学校。传世文献基本未见亦集乃路学校

① [宋]朱熹撰，严文儒点校《童蒙须知》，第371页。

② 塔拉、杜建录、高国祥等编著《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七册），第1564页。

③ 塔拉、杜建录、高国祥等编著《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七册），第1564页。

④ 塔拉、杜建录、高国祥等编著《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七册），第1564页。

⑤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57页。

⑥ [明]宋濂等撰《元史》，第2029页。

⑦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57页。

⑧ [明]宋濂等撰《元史》第7卷，第2027页。

建筑的记载，黑水城出土的文书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也很少。黑水城出土的编号[F39: W1]文书为研究亦集乃路的学校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该文书共有两个残页，据《李书》录文如下：

(残页一)

- 亦集乃□儒学教授李所关为本
- 文卷等物事理随此发去仰将文
- 从实交割收管施行须至
- 将文卷等物各各开写于□
- 至关者
- 万岁牌壹面 大小奠牌壹拾伍面
- 香桌儿陆个 大小破损香炉伍个
- 高桌儿叁个 长床肆个
- 破单肆片 破铁小锅壹口
- 文庙壹所门窗俱全 明经堂小斋堂门窗
- 诸学官照会壹宗 即的站学田卷壹宗
- 早忽鲁学田卷壹宗 天牢地基卷壹宗
- 于德充儒户卷壹宗 苏回□充儒户壹宗
- 杨天福充儒户卷壹宗

(残页二)

- 瞻学承板指挥壹道
- 杜延寿充儒户卷壹宗
- 金祐甫充儒户卷壹宗
- 杨仲明充儒户卷壹宗
- 徐玉立沙充儒户卷壹宗
- 诸杂支文卷壹宗 卷一宗
- 并无
- 右 ①

元代统治者重视教育，兴建学校，设置学官。据申万里研究，元代的儒学建筑主要分为“庙”“学”及其它教学、生活辅助设施等三部分，^② 而且具有“庙学合一”^③ 的基本特征。据上述文书内容所示，亦集乃路的儒学建筑亦为庙学一体，且配有教学、生活辅助设施。

①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95页。

② 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8页。

③ 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第297页。

由上述文书可知，亦集乃路有“文庙一所”，据其无从知晓亦集乃路文庙的规模，只知道“门窗俱全”。“儒学中有关庙的建筑还有祭器库、乐器库、神厨、更衣所、肃容所等”。^① 据该文书还可推测，亦集乃路的文庙里应该也有祭器库和神厨。文书中提到有“万岁牌”“香桌”“香炉”等祭祀所用物品，这些应该是存放在祭器库里的。文书中还有“破铁小锅一口”，应该是神厨用具。至于“乐器库”“更衣所”“肃容所”，文书内容并未显现。文书中还有“长床肆个”与“破单肆片”的字样，床与单数量皆为肆，所以，“破单”应该是破床单，这是用来住宿的，体现了亦集乃路“斋舍合一”的特点。黑水城出土文书中，刚好也有“小斋堂”的字样。学斋是明伦堂的附属建筑，被作为宿舍来用，是其功能之一。“弦诵之馆，斋宿之庐”^② 正是说明了这一功能。学斋有大有小，一般情况下，路学建筑规模较大。但是，与江南儒学学斋的规模比，亦集乃路的学斋规模必然不大，从“小”字可以看出。学斋规模不大，也说明生员数量不多。亦集乃路的学校建筑风格基本与中央保持一致，只是在规模和设备方面甚为简陋。至少从出土文书看，“破损香炉”、“破单”、“破铁小锅”等字样表明此时学校设备破损不堪。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亦集乃路大概的教育状况，以启蒙教育为主，教材多为儒家经典，学校也具有“庙学一体”与“斋舍合一”性。

^① 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第300页。

^② 《两浙金石志》卷十四《元处州路新修庙学碑》，载《地方金石志汇编》（四十一），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2页。